



老上海

熊月之 高纲博文 主编

透视

中日青年学人的上海史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866790

K295.1

X650



熊月之 高纲博文 主编



老上海

透视

中日青年学人的上海史研究

78667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老上海 / 熊月之, 高纳博文主编. —上海: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80681-499-X

I. 透... II. ①熊...②高... III. 上海市—地方史
—研究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3463 号

透视老上海

主 编 熊月之 高纳博文

责任编辑 载 之

封面设计 王培琴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021-63875741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499-X/K·115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熊月之

序 一

最近 20 来年,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其中,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 1990 年就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那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定期举行读书会、研讨会,组织课题,出版论文集和各种著作。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自筹经费,参加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间断。他们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举行过多次讨论会,组织过读书会,讨论上海学者所编写的《上海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通史》,也举行过关于上海人物、租界、文化、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等研讨会。每次开会,都准备充分,讨论深入。以此为基础,他们还出版了一系列与上海史密切相关的书籍,对扩大上海的国际影响,传播上海史研究成果,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学术交流频繁,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有学者往来,或参加会议,或作访问研究。鉴于研究上海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经商量,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会议共收到 16 篇论文,提供者都在 40 岁以下,评论人则是岁数较长、资历较深的学者。会议经办人也都是年轻人,中方以廖大伟、甘慧杰为代表,日方以岩间一弘为代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的大小与学问的深浅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在一般的学术讨论会上,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总要少些。我们选择这种开会方式,目的就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开过很多以上海史为主题的讨论会,但以年轻人为主角的这是第一次。会议开得朝气蓬勃,非常成功,详细情况可见本书综述部分。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中心人物有高纲博文、小浜正子、菊池敏夫、孙安石等，灵魂则是会长古厩忠夫先生。古厩先生为这次会议倾注了大量心血。会议原定由我和古厩先生共同主持，先生因病未能到会，所有到会者均深为怅憾，都衷心地祝愿他早日康复。令人万分哀痛的是，古厩在2002年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谨向古厩忠夫先生表示深深的悼念。

二〇〇四年三月六日



1843年时的上海外滩(局部)

[日]高纲博文

序 二

2002年9月4日至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共同举办了“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际学术交流来培养年轻的上海史研究者。在上海近郊的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有约40人参加会议,其中16名青年学者发表了报告,经过2天的报告及活泼的讨论,会议达到了比预期更好的目的。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是为此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诸位努力的结果。为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向全面负责会议并无微不至地予以关照的熊月之所长和会议事务局的担当者廖大伟先生表示敬意!

这次会议的主要题目是“近代上海的社会和文化”,从发表的报告来看,已涉及上海的交通、慈善事业、出版、风俗、建筑、各种团体等广泛的研究题目。许多青年报告者积极利用档案史料,热情地进行研究发表,从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不同的视点出发,对未曾发掘过的对象进行历史的分析,这些报告令人惊喜地感觉到新的上海史研究的胎动。

本次的“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发端于2001年夏天,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会长古厩忠夫先生和我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先生提出共同召开的请求。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是出于培养年轻的上海史研究者及促进与中国上海史研究的青年学者的学术交流的目的,强烈希望在上海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熊月之所长立即答应我们的请求,并同意历史研究所给予全面的协助。因此,这次日本方面的参加者很多,包括4名报告者在内,总数超过了20人。



在此,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举办这次研讨会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是日本的民间研究团体,以不同大学的研究上海史的教师和研究生为中心,对上海史有兴趣的一般民众也可参加。研究会自1990年创立以来,由于有上海的中国研究者参加,在更好地把握上海这个巨大都市所具有的多重侧面性方面积极地进行共同研究,并发表了以下的成果:

《日本学者论上海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与人们的营生》,日本东方书店,1995年

《上海人物志》,日本东方书店,1997年

《上海——多层性的网络组织》,日本汲古书院,2000年

《日本侨民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上海:形形色色的职业》,日本勉诚出版社,2002年

现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从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方法,更进一步地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议论入手,向综合的研究发展。新的上海史研究,无论如何都是都市的历史,为解明其制度和结构,都市行政及左右地域的统治层、都市社会多样的网络以及它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都成为主要的研究题目。此外,在日本,上海是历史学以外的领域最集中的注目点,其代表是建筑学、电影论和中国文学。上海的西洋建筑和电影,无论哪一方面都是1920~1930年代“摩登上海”的象征,作为“中国内的西洋”的上海形象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在日本,以“上海事物”为题的一般书籍传布着那样的上海印象。

我们日本上海史研究会设立的动机有两个:一是中国的上海史研究日益活跃,我们为了与担负其任的中国研究机构和中国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有必要作为日本方面的托盘。一是以学术研究来论上海,对在日本环绕因上海流行而出版的所谓以“上海事物”为题的一般书籍所描写的上海印象的差距,即使很少,也是需要弥补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为响应后者的课题,以专门研究为基础,出版了几本以广大的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有关上海史的书。其中代表性的一本是在日本尝试以上海通史形式写的《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与人们的营生》。此书吸收了近年的内外研究成果,着眼于上海都市社会和“上海人”的形成。此外,开埠

以后形成的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内的西洋”，而且是通过中国社会与西洋文明的对立、争夺、融合，形成既不是“传统中国”也不是西洋的独自的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过程，古厐忠夫先生称其为“克里奥尔人的上海”。今后对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来说，我们被上海这个魅力洋溢的都市所诱惑，其活动不会停止吧！我们研究会旺盛的活动，或许是上海无论今昔都散发着多样能量的反映。

本次“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及其作为成果的论文集的刊行，是日中两国上海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大契机，更期待着它能促进国际上海史研究迈向新的台阶。



1893年时的上海外滩(局部)

目 录

序一	熊月之(1)
序二	[日]高纲博文(3)

社会解析

论上海成长发展中的“江南因素”	马学强(3)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	方 平(21)
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陶水木(42)
城市化中的上海闽商	
——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	高红霞(71)
近代上海钱庄信用特点探析(1843~1936)	张秀莉(85)
近代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述略	
——以结构与功能为中心	赵兰亮(101)
近代上海人力车行业的结构	
——以 20 世纪 20~30 年代公共租界为例 [日]佐佐木清美	(139)
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化(1927~1937)	廖大伟(155)
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	马 军(165)

文化视点

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1912~1921)	周 武(187)
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与民族形式	[日]铃木将久(210)
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	
——中国数学会在上海	张 剑(225)



生活场景

近代上海服饰变迁及其动因分析

石磊(249)

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

——城市菁英及中产阶级之城郊宅地的形成 郭奇正(267)

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

——近代中国都市的新中间层初探 [日]岩间一弘(292)

中日两国的YWCA及其相互交流

——城市中层妇女的社会活动与基督教 [日]石川照子(308)

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综述 廖大伟 甘慧杰 葛涛(321)

社会解析



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长期以来一直是近代上海发达繁荣的标志

马学强

论上海成长发展中的 “江南因素”

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准允英人在这里贸易居留。1843 年,一位曾经当过陆军上尉的英国人叫巴富尔(George Balfour)来到上海,在县城内租赁了一处房屋,设立领事馆。作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他宣布上海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开埠。

开埠前的上海,为江南松江府属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所产的棉布在江南区域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另一个影响是在海运上,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之声誉。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 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 20 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期,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①。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还不能算是中心城市,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壮县”。

开埠以后的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开埠后 10 年左右,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 50% 以上;开埠后 30 年左右,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1890 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1900 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 100 万,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成为全国货币发行的枢纽,外汇和金银交易的总汇,当时中国所谓“四行两局”的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从世界都市来看,上海是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城市,在港口与人口规模上,1922 年上海港已位列世界六大港口之一;



1934 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 335 万。^②

随着上海地位的上升,有关上海成长发展的动力或因素问题的讨论也随之而起。翻翻近代中外发行的各种报纸,这种讨论随处可见。集中的讨论就有几次,如 1893 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纪念”,其间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官员、商人发表言论,对西方人对上海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论,其中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上海是我们高度文明和基督教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中心”,这里“按照我们的司法和市政当局的要求,法律和秩序……极为美好地保持着”^③。很明显,照他们看来,是“外国人的统治”创造了上海。当然,很多华人并不这样认为。1930 年代初,在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收回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得不邀请南非联邦最高法院费唐法官前来调查的背景下,上海的外国侨民与华商各界又就上海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发生争论。概括起来,有几种观点:(1)“租界的政治地位”——外国人的政治控制而产生的安全保障——这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唯一重要因素,很多外国人持这样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们即将丧失而又不甘心丧失在上海的特权时;(2)上海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大城市;(3)一种比较折衷的观点,即承认外国租界在早期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对促进资金和商业在上海的集中有其重要性,但“治外法权”一旦废除,上海因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依然会保持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得到足够的贸易资金供给。^④

在近代上海成长的历程中,“外国的力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但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并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则与周边地区所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换言之,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国而主要是江南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这些资源在以往的社会环境中,则是构筑“农业文明的基础”,至近代被组合到上海后,才发生了变化。

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近代上海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开埠后的上海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窗口”,在近代起到了它的作用;“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上海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西化”、“国际化”的都市代表。面对一个特色如此彰显的城市,它与“本土”有机相连的部分自然会被有意无意地掩藏起来。本文即以上海成长与传统江南之关系为题,探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近代上海不是一块“飞地”,它的发展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人文环境密不可分,这就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江南因素”。

一、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⑤。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东部、北部一带。

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明清时期江南在全国的地位。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⑥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⑦。这一比重此后有增无减。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17%（全国总计3021万两）。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⑧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产丝区。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北部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植与加工结合的棉纺织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环太湖一带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可能达到5600万匹^⑨。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扩大到20万匹。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



光十年(1817~1830年)两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¹⁰。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除“贡品”以外,民间丝织品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有详细论述。

粮食、丝、棉之外,其他如茶、麻苧、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在江南地区都有专业化的生产。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

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每年要从这里输出大量的米粮、丝绵织品以及其它各种物产,同时它是国家最主要的财税基地,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富庶莫过江浙”,而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又集中在运河沿岸。过了长江,运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诸城市,在苏州、嘉兴之间,有河港各与湖州、松江府城相连。这些城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江南的运河沿岸城市中,苏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指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繁荣,这方面的记载是大量的:“四方巨商富贾鳞集之区,灿若锦城,纷如海市”¹¹;“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¹²时苏州号为“江左名区”,其声名文物,播扬天下,且被视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¹³苏州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江南地区以平原为主,这里河网交织,港汊纷歧,却又“湖河联络”,众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了一张稠密的水网。这张水网把江南区域内的各个点,大至省会、府城,小到市镇、村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水路河道的这种经络关联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行政控制离不开“左右逢源”的水网,漕粮、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贡品也要借助水道的运输,商人往来、贸易的兴衰更是维系着河道的变迁,以至文人赶考、文士结社也都依赖水路进出。发达的水运为江南在空间地域上的沟通与整合创造了便利条件。在四

通八达的江南水网中,苏州无疑居于“要津”位置,处太湖之东,太湖水由江河入海,支流蔓延,贯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无锡为其首,以松江为其足,以湖州为其背,而以苏州为其胸¹¹。处于“胸”腹的苏州,又经南北大运河,而与全国各地相连贯。其二,历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加固与强化苏州的地位。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鉴于苏州地理位置的突出,历代均较重视苏州的建置,从其沿革来看,先后有吴郡、吴州、苏州、中吴军、平江等不同名称,所辖管的地域范围屡有伸缩,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府辖属的地域基本稳定,形成了“三县附郭而居,六邑环其外”的格局,并延续了五百年。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苏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

江南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杭州,在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12、13世纪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万左右。

与苏、杭等繁华都会相比,那时的上海僻处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实行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整个江南的交通与商业网络是以运河为中心,运河承担了这一区域大部分的物流。在以运河为主的运输体系中,上海只是一个末端。但上海具有滨江临海的特点,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又预示着上海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迹象在上海通商开埠以前已有所显露。康熙以后沿海的“开禁”,作为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嘉庆《上海县志序》中写道:

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翠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

以“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来描写一个县城,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其间虽不排除有文人夸张溢美的成份,但确也部分道出乾嘉时期随着海禁的开放,上海因港兴市、商贸发达的事实。作为对运河的“补充”,上海作为沿海港口,还具有的另一种意义是:当运河残缺,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道光初年,南北大运河